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典论·论文》文体学思想甄微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曹丕的文体学思想中,最具争议的是“文本同而末异”这一命题,尤其是何为“本同”众说纷纭。“本同”指各种文体都源出五经,这反映了曹丕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的。从归纳并类着眼,“四科八体”的“四科”就是“四分法”,它对真德秀的“四目”法产生了影响,而其源头则要溯至孔门四科、类书分类以及目录学“四部”等。

关键词: 曹丕; 本同末异; 文源五经; 儒家思想; 四科八体; 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 H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4)01-0092-08

收稿日期: 2013-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W0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A751059);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szd03)

作者简介: 任竞泽,男,内蒙古宁城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体论是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言论虽然很简要,但内蕴却极丰富,形成了颇为完备的文体学思想体系。历来批评史著作都会提及,现代学者专门研究成果也很多。最具争议的是“文本同而末异”,尤其是何为“本同”及“本”与“末”的关系,可以说众说纷纭。笔者综罗众说,或存疑,或辨惑,进而提出自己的一陋之见,认为“本同”指“五经”,即所有后世文体都源出于“五经”,这从中反映出曹丕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的。而这与中国思想史和批评史所普遍认同的论断,即他打破了两汉以来盛行的传统儒家思想是矛盾的,这就需要辨析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关于“四科八体”之文体分类说,历来皆认为开繁杂琐细的文体分类之先河,这属于“类分”体例。本文则从“类从”即以简驭繁的归纳并类着眼,指出“四科”就是“四分法”,并对真德秀《文章正宗》“四目”法产生极大影响,而其源头则要溯至孔门四科、类书分类以及目录学“四部”等。曹丕的“四科”“四分法”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据笔者陋见,学术界还未见有相关研究,本文尝试言之。

一、“本同”为“文源五经”辨

“文本同而末异”是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总纲,关于其重要性,正如郭绍虞所云“在曹丕以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限于本而不及末,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是曹丕首先提出来的,它推进了后来的文体论研究。”^{[1]164}张少康所说“曹丕所说的‘本’和‘末’指的是什么,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2]169}敏泽也称“在这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专篇论文中,曹丕第一次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理论”^{[3]203}。历来学者对何为“本”、“本同”及“本同”与“末异”之关系,可以说歧义迭出。最早为众多批评史著作所关注并加以解释,近年来一些学者则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命题,并给出各自不同的见解。综合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观点。

首先,大多认为“本同”是指文学的共同本质、一般规则、普遍规律、思想感情等,“末异”指的是语言形式、文体风格、艺术体貌、具体功用等,二者是内容和形式、共同性和独特性的关系。这以文学批评史家的观点为代表。择其要者,如郭绍虞先生认为:“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

性。”^{[1]162}“所谓‘本’，大致是指基本的规则而言，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所谓‘末’，是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1]163}张少康说：“‘本’当是指文章的本质，即指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内容，而‘末’则是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这种表现形态包含有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两方面的意义。”^{[2]169}敏泽称曹丕“认为一切文章在‘本’上，——也就是从它们都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表现这一根本之点看，一切形式的文章都是相同的；但在每种文章的表现上，或者用曹丕的不一定十分恰切的说法——‘末’上，却因它们的具体功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曹丕还根据这种看法，对文章形式方面的特点作了概括”^{[3]203}。周勋初认为“什么是文章的‘本’，曹丕没有明言，应当是指文章写作上的一些根本原则吧。什么是文章的‘末’，他却作了说明，并对当时几种主要的文体作了综合的分析。”^{[4]20}朱恩彬等认为：“他所指的‘本同’，指一切文章在性质和创作规律上的共同要求。”^{[5]100}章新建说：“‘文本同’是指文章都是表达作者一定的思想感情的。”^{[6]57}吴承学认为：“‘本同’指一切创作的共同特征和要求……‘末’也就是各种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认为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上。”^[7]张进云：“在曹丕看来，各类文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在具体表现方面却各异。对于文章本质上的共同性，曹丕没有具体展开论述，可见这不是他论述的重点。”“曹丕所强调的是‘异’，即各类文章的独特性。”^[8]等等。

以上关于“文本同而未异”的解释，基本代表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一些重要批评史著作和文体学者的相似看法，这当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多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来论述的模式有关。这样解读可以说是曹丕的本意之一，当然更因为郭绍虞、张少康、敏泽等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巨大成就和影响，故而这种观点也普遍被学界所认同。尤其是郭绍虞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选》和张少康的批评史多被用作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教材，其传播也极为广泛。

其次，“本同”与“末异”是“质”与“文”的关系。如刘运好先生在综合学界关于“本”的看法后给出自己的解释：“那么‘本’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本’就是指传统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术语‘质’。”^[9]刘天庆同意其看法，并称“在古典文艺学中，‘质’指的是文章的内容，与代表形式的‘文’相对”。同时用陆机的文体论进行比较解读，称“陆机对‘本同’的认识是传承了曹丕的想法，仍然把‘本’阐释为内

容，陆机用一个‘理举’进行概括，同时，内容与形式还应该符合‘文质彬彬’的要求，即‘辞达而理举’，这就比曹丕的认识完善多了。”^[10]可以看出，二者的观点与前边所列批评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虽说没有超越，但已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并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了。刘运好比较诸家之说提出的质与文说，尤其是刘天庆用陆机“辞达而理举”加以补充说明，其贡献在试图为前举观点找到理论根据。

第三，“文本同”言文章的作用是相同的。朱全庆等不同同意上述观点，在综合列举之后，认为“我们可断定曹丕的文之‘本’绝不会是今人所谓文学的本质……曹丕的‘本同’是指一切文章作用相同，他视文章的作用为‘本’，而文章的作用便是经国济世，没有超出儒家功利文学观的范畴”^[11]。

第四，“本同”指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末异”指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郭英德在《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一文中认为“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未异’，精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12]56}

第五，胡红梅在《曹丕文体学思想新解》中对“本同与末异”有几层解释，除了所谓“本同”指所有文章的基本规范、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和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等，与第一类观点和朱全庆等的文章作用说相似之外，其“新解”有四：一是完全从“文体”的角度来解读“本同”和“末异”，称“本同”指所有文章之共同之体。认为“各家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谈及曹丕的文体论时”，“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从文体的本质与功用角度来解读他的‘文本同而未异’”。二是把“本同”解释为“文以气为主”，理由是“主”即“本”。三是因为都从“文体”的角度出发，所以对本同、末异的解释便都着眼于“形式”，这与之前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解读便有所区别，所以她认为“本同末异”之论，揭示了文学表现形式的共同性和多样性统一。四是把“本同而未异”看作“体一而用殊”的另一种表述方式。^[13]

以上梳理了近30多年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文本同而未异”这一命题阐释的历史演变和研究现状。正如大多学者所言，由于《论文》文体言论的简略，以及曹丕未对“本同”透露出片言信息，所以出现了上述歧见和争议。当然，争鸣中见仁见

智,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丰富内蕴和学术含量,一方面也推动了这一文体理论的发展和深入。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应该都有其合理之处,当不必为求新立异而全盘否定之。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和魅力所在。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胡红梅的研究角度有可取之处,即对“本同”也从“文体”角度来看——既然“未异”指四科八体,那么“本同”自然也应以“文体”来对应阐释。胡红梅称之为“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不过,我们不同意其对这个“共同之体”的多种解释。

笔者赞同郭英德的分析和推理,或者说他的解释最接近我们的结论。尽管他把这个“本体”即“本同”归结为刘勰所谓的“天地之心”,但他接下来的论述称“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据上下文逻辑关系,可以认为他指出了这个“本同”即所有文体的共同本源就是“五经”,并引用大家所熟悉的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关于“文源五经”的著名论断,最后总结“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12]56}。郭英德先生该文是在总结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时提到“文本同而未异”的,不是论曹丕文体观的专题论文,故而容易被忽略。

要之,曹丕的“文本同而未异”是指后世所有文体都源出五经。那么,这种说法有依据吗?以晚于其三、四百年的刘勰和颜之推的理论来验证有说服力吗?还有学术思想史上公认曹操、曹丕父子都是打破儒家思想的,这样说来“文源五经”的结论还能站住脚吗?凡此种种,我们需要再结合相关文献进一步说明。

其一,在曹丕这里,“本”和“末”之间的关系实则是“源”与“流”的关系。自汉代以来关于“文源五经”的“宗经”说,多以本末、源流来表述。曹丕之前,如扬雄《法言·吾子》云“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未矣。”^{[14]5}《汉书·扬雄传赞》称其“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15]176}曹丕之后,刘勰的文体研究方法便是“原始以表末”,所谓始、末即本、末,是其“宗经”说的体现。如《宗经》云“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本归末,不其懿

与?”^{[16]23}《诠赋》:“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16]136}《序志》篇中,他关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之推源溯流方法的形成,正是有感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而发的。^{[16]726}

其二,曹丕“文本同而未异”之“文源五经”的文体论,应当是扬雄到刘勰的一个链条,刘勰应该是对曹丕这点看到并有所继承的。但是刘勰却对其有所指责,如《序志》所云“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16]726}认为其主要是“臧否当时之才”,即以品评建安七子之短长为主。的确,曹丕仅提到“文本同而未异”的理论,却没有对具体作家作品付之源流本末的实践,故而责其“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也不无道理。但是在文体分类和各种文体都源于五经这点上,刘勰显然受到曹丕的影响。

其三,曹丕精熟五经,亦重视五经。如《与朝歌令吴质书》云“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17]8}《典论·自叙》云“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17]12}曹丕诏命王象、刘劭等撰集第一部类书《皇览》。《魏志·刘劭传》云“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18]260}列此文献以证曹丕“文源五经”说并非空穴来风。

以上我们对批评史上“文本同而未异”这一悬而未决的命题进行了梳理、甄别及诠释、论证,认为曹丕本意指所有文体都源出五经。这样说显然是承认曹丕的思想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的。这与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学史、批评史上人尽皆知、不可更改的定论相矛盾。那么,我们的立论还能成立吗?

二、曹丕的儒家思想辨

汉末大乱,曾盛极一时的儒学呈衰颓之态,玄学乘势兴起。其中,曹氏父子打破了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传统,而他们相关的政令和言行则为这一思想转关推波助澜。这类观点几乎成为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文学史和批评史的通识和定论,简直不容置疑。我们以下列举中国批评史上部分重要学者的主要观点,比较对照,以见大概。

朱东润云“迄于汉末,君主屡迁,中国分裂,而儒家尊君大一统之说皆不行……开此四百年之局者为建安时代,而曹氏父子兄弟实主持之。曹操《敕有司毋废偏短令》云……此才行不相掩之论既发,至曹丕始有文行不相掩之说。丕《与吴质书》云: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自是而后，文学始与儒术歧途。”^{[19]24}

刘大杰云：“儒学在汉代虽盛极一时，到了魏晋，便呈现着极度衰微无力的状态……曹操一当权，便采取法治政策，尚刑名。他所需要的人才，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权谋之士，看不起那些讲德行学问、重礼义名节的儒生，接二连三地下着《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举士令》）；又曹丕《与吴质书》云……进取之士未必有行，文人不护细行，这都不合于儒家的思想。傅玄在《举清远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又鱼豢在《儒宗传序》中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在这些言论里，正反映出当代思想界变化的实况。由于儒学的衰颓，儒家的原道、宗经的文学观点，就失去了对于文学的指导作用。”^{[20]232}张少康云：“（汉末）全国陷入了动乱、分裂、割据的局面，作为大一统思想支柱的儒家学说也丧失了其统治地位，而开始衰落了……曹操掌权之后，注重刑名法术思想，提倡‘唯才是举’，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盗嫂偷金’，道德上有缺点也没有关系。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动摇，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21]160}敏泽云：“曹操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儒家思想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鱼豢《典略·儒宗传序》），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所以鲁迅先生说‘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3]171}敏泽在谈“文与行”时云：“此外，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提出‘文人’之行，不一定需要‘名节’，这正是乃父曹操政治上用人不拘德行的选拔人才的思想在文学理论上的一种反映……因此后来曾经受到许多礼教思想浓厚的人的指斥和非议（如傅玄在《举清远疏》中所说的……）。”^{[3]224}郁沅等云：“曹氏父子都非儒家信徒，傅玄《上晋武帝疏》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倡的‘文气’说，便是以重视个性自由发展的道家思想为指导的。”^{[17]20}

诸如此类，现当代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著作

亦多持此论，不可枚举。可以看出，诸家批评史在论述时大多首先以曹操的《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敕有司毋废偏短令》以及曹丕《与吴质书》中的言论为据，继以魏晋人鱼豢《儒宗传序》以及傅玄《举清远疏》中对曹氏父子及时事思想的评价佐证，再以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进行强化。这样，从曹魏统治者曹氏父子的直接言论思想，到同时或稍后的魏晋史学家鱼豢和傅玄的历史总结，再到近现代文坛领袖鲁迅的经典论断，再到上述众多现代批评史大家的著述传播，便形成了一条文献完备、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自此这一思想史铁案便告铸就。果真如此吗？

首先，“文人无行，不重名节”辨。上举诸家批评史在论述曹丕思想时，都举其《与吴质书》中所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为例，辅以曹操“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为证，再加之傅玄总结的“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之论，都认为曹丕这句话是明确主张文人可以无德行、轻名节的。我们说，从傅玄起就对曹丕之文断章取义了。请看《与吴质书》这句话上下文：“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皆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1]165}很明显，“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皆能以名节自立”是感慨于士风日下的惋惜之言，是为徐干而发的。“而伟长”以下，一个“而”字，转入对徐干具备儒家德行和著述不朽的由衷赞叹。也就是说，曹丕以鲜明对比来说明他是坚决反对文人无行，不立名节的。傅玄作为一个史学家、政治家，在晋初需要树立儒学思想根基来为国家大一统服务的政治诉求下，娴熟运用“赋诗断章，予取所求”的笔法，是完全可以让人理解的。此外，《典论·论文》的结语“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也反映了他“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儒家“三不朽”思想。同样，《与王朗书》亦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17]16}。凡数次，反复申述其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那么，是重德还是轻行，是打破还是笃守，已自分明了。

其次，我们再举以曹丕关于崇孔尊圣的仁义道德言论，来说明曹丕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的。除了上文所举曹丕精熟五经和重视五经的文献外，它如《轻刑诏》云：“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21]69}《追崇孔子诏》云：“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是

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也。”^{[21]56}《典论·自叙》云:“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17]12}再如“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17]15}等等。

第三,我们再看卞兰对曹丕的评价。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怀近服远,非德无施……学无常师,惟德所在;恩无所私,惟德所亲……德生于性,明出自然……超古人之遐迹,崇先圣之弘基……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论古贤以叹息,睹懿德以欢娱……嘉通人之达节……惟凡百之咏德。”^{[17]21}曹丕与卞兰虽为君臣,实乃表兄弟。本文似有阿谀之嫌,如曹丕回信《答卞兰教》所谓赋颂应“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云云,实则在自谦中亦自领受,故嘉卞兰之义而“赐牛一头”。

第四,至于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对建安七子惟一极口称赞的徐干,其德行著述、为人作文以及正统的儒家思想自然正是曹丕所认可和赞赏的。徐干亦精熟五经,“笃行体道”,如汉无名氏《徐干〈中论〉序》云“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考其德行文艺,实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岂不惜哉!……统圣人中和之业,蹈贤哲守度之行。”^{[17]56}曾巩《徐干〈中论〉目录序》:“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22]455}最能体现徐干儒家思想的是被曹丕赞誉为“成一家言”之《中论》,我们择其要者,以见大概。在论德与艺、文与道关系上,也如曹丕般反复以“本、末”相称。如《艺纪第七》:“艺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君子者,表里称而本末度者也……存乎六艺者,着其末节也……非礼乐之本也。礼乐之本也者,其德音乎?”^{[17]50}《修本第三》:“民心莫不有治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近末。君子之治也,先务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其末,故功废而仇多。”此外,关于立德、立

言、“不朽”之论以及原道、征圣、宗经之说,也是《中论》的主要内容,也与曹丕之相关言论和儒家思想极为契合,这无疑是曹丕激赏徐干及其《中论》的重要原因。如《治学第一》:“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贤者不能学于远,乃学于近,故以圣人为师。”《贵言第六》:“君子必贵其言,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不可枚举。

第五,建安黄初时,桓范等在曹丕诏令下,“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而他的三篇文体论则是回应曹丕文体论的典范,其中的儒家思想可以验之于曹丕。如《赞象》:“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17]61}《铭诔》:“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上罔下,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17]62}《序作》:“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17]60}很明显,其富贵名灭、篇论不朽之言与曹丕如出一辙。

其他诸如曹操、曹植及建安文人之儒家思想及相关言论,如曹植《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17]26}。《王仲宣诔》:“君以淑德,继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广宣。”^{[17]28}王粲《吊夷齐文》:“守圣人之清概,要既死而不渝……虽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誉。”^{[17]4}等等,不一而足。

当代学者也有持此观点的,如孙明君反对傅玄“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之论,并引《轻刑诏》和《追崇孔子诏》来说明,而后云“它并没有打破儒家传统观念,相反,它要努力使文章成为经治国家的工具……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在社会政治层面,他始终以传统的‘儒者’自我标榜……至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其说它是冲破儒家观念的号角,不如说它是号召文士用文章为一统大业鼓与呼,自觉接受认同于原始儒学的思想观念的倡议书”^[23]。

三、“四科”为“四分”分类说

曹丕的“四科八体”说是其文体学的核心,而“四科”和“八体”分别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分类方式。“八体”说属于繁杂琐细的文体分类,这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主流。历来学者关注的焦点大都

在“八体”之分类,并与陆机《文赋》的“十体”进行比较,称陆机进一步细分为十体,再到《文心雕龙》三十三类、《文选》三十八类、《文苑英华》五十五类、《唐文粹》十六类、《宋文鉴》六十一类、《元文类》四十三类、《明文衡》三十八类、《文体明辨》一百二十七类等,显示了文体分类日趋繁复的事实。学者常常把曹丕“八体”作为这一分类方式的起点。

“四科”则属于化繁为简的文体“归类”,在分类方式上执简驭繁,更具有学术意义。这种文体分类史上的“四分法”,当以真德秀《文章正宗》“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四目”为代表。已有部分当代学者注意到真氏“四目”的分类特征和意义,但大多只做简要评价,未见深入研究者。笔者有专文论述,其中也涉及到曹丕“四科”对真氏“四目”的影响,但还是非常简略。本文在简要比较曹、真“四分法”的继承关系之外,重点论述孔门四科、《皇览》编纂的“以类相从”以及目录学“四部”等对曹丕“四科”分类形成的影响。

首先,在总集分类中,曹丕“四科”对《文章正宗》“四目”的影响。真德秀“四分法”在繁杂琐碎的文体分类主流之外,完全打破了以体类体裁划分分类目的传统思维方式,而以文体的表达功能或者说表现方式来概括归并文类,从而包尽诸体,即吴讷所谓“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当代学者诸如钱仓水、赵逵夫、郭英德等对其开创之功和深远影响屡有表述。如钱仓水称其“采取了文体并类办法”,“开了后世分门系类的先例”。赵逵夫先生也称“这是我国文体分类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具有开创的意义。”“因为象‘议论’、‘叙事’这样的完全从形式和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高度概括的划分,此前确实还没有过。”所谓“先例”、“开创”、“没有过”云云,显然都忽略了“四分法”最直接的渊源当属曹丕的文体“四科”之并类模式。真氏“四目”与曹丕“四科”名异实同,深为契合。在文体类目和数量上,曹丕并非说只认识到上述四科八体,这应该是有意识地对当时文体日繁态势的简略概括,就像真氏“四目”一样。两相比较,可以这样说,“奏议”乃朝廷应用文字,也即“辞命”;其“宜雅”也即真氏要求辞命有“深纯温厚”之旨和近于古雅。“书论”也便是“议论”之“谏争论说”和“书记往来”者“宜理”即“议论”之或“发明义理”、“或专析治道”。“铭诔”便是“叙事”之“碑志事状”之属,以叙事为主“尚实”也正是真氏“叙事”所谓“防于汉司马氏”,因《史记》之创作原则便是“实录”;而所谓“典则简严”也即“尚实”的意思。“诗赋”则名称全然相同,其“欲丽”也即真氏所云“悠然有自得之趣也”。不难看出

出,其分类次序都完全相同,沿承之迹宛然。^[24]

其次,孔门“四科”对曹丕“四科”的影响。《论文》云“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也就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说明了文体“四科”不同与作家才能短长的关系。这种文体观的出现,有其政治文化学术原因,那就是与当时政治上唯才是举、因材施教、任得其才、才堪其任的思想背景有关。对此,张少康云“《典论·论文》中心在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是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联系着的……当时的才性之争,即研究人的才能与禀性关系的理论,是研究人君在设官分职时如何使官职与爵位相适应,才能与官职相符合。爵位大小与任职的重要与否能不能一致,官吏的才能与任职的要求是否合适,这是人君能否无为而治的关键所在。为此就要研究人物的才能个性特点与所任职事的特点和需要。”^{[25]167}

这正继承了“孔门四科”之“各因其材”和“须尽其所长而受其职”的分科思想。孔门四科包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七十二弟子各有所长,分属四科之一。这正如宋文彦博《答奏》所云“用人之法,当各因其才器。孔门四科,分政事、文学之品,须尽其所长而受其职,职乃无旷。”^{[26]736}明梁潜亦云“朱子曰:自隋唐专以文章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孔门四科,各因其材。为治如成周,为教如孔子,亦云可矣。”^{[26]201}清王澍借书法之喻也说明了孔门之分“四科”的道理“虞得右军之圆,欧得右军之卓,褚得右军之超,颜得右军之劲,柳得右军之坚。正如孔门四科,不必兼擅而各诣所长,皆是尼山血嗣。”^{[27]638}其间的关系不言自明。周勋初先生也看到了“四科”不同与才能偏通及品评人物与选官授职之间的关系。其云“曹丕提出四科八类,认为一般文人只能各有专长,只有通才才能贯通。这种认识,也是时代思潮的表现。东汉后期品评人物的风气已经形成,而自全国分裂之后,各地军阀竞相网罗人才,他们注意了解各个人的特殊才能,然后授予合适的职位。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才能往往有所偏长,问题就在发现并利用这种偏至的人才。”^{[4]21}

第三,“四科”之“类从”归纳分类法与曹丕诏集编纂类书《皇览》之关系。据胡道静介绍,中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是《皇览》,由魏文帝曹丕诏命刘劭、桓范、韦诞、王象和缪袭等人编纂。《玉海·艺文·承诏撰述篇》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命名之意,即“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内容上,则“包括群言,区分义别”。《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说:“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魏志·刘劭传》:“黄

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28]53}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有“类分”和“类从”两种方式^{[12]151},前者是繁琐细分,以《文选》类总集为代表;后者是合并归类,以《文章正宗》“四目”法为代表。前文已谈过曹丕“四科”对真氏“四目”之文体四分法的影响和关系,那么,曹丕诏命编纂的类书《皇览》之“随类相从”“以类相从”及“区分义别”的“类从”区分方法,与其文体“四科”的合并归类法有密切关系,应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傅刚认为(《皇览》)“以类相从”的体例也影响到总集的编纂。如挚虞《文章流别集》,采取的就是“类聚区分”的体例。”^{[29]35}

第四,曹丕之“四科”与目录学“四部”之关系。关于目录学之“四部”类例演变,大体如余嘉锡所言“晋武帝太康二年,得汲冢古文竹书,以付秘书,于是荀勖撰次之,因郑默《中经》,更著新簿,遂变《七略》之体,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是为后世经史子集之权舆,特其次序子在史前……迨及东晋,收集散亡,李充作《晋元帝书目》,但以甲乙丙丁四部为次,又将《中经新簿》之乙丙两部先后互换。即《晋书·李充传》所云‘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自晋宋至今官撰目录,则皆用四部。”^{[30]96-98}也就是说,西晋初年的荀勖和东晋李充的“四部”法之源头的在魏郑默《中经》,就如来新夏所分析的“《新簿》是按四部分类,那么作为它主要依据的魏《中经》大致也是采用的四分法。因此,郑默所撰的《中经》很可能是一部以四部分类的国家图书目录,对我国图书分类学作出了开创四分法的贡献”^{[31]87}。

至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郑默和荀勖都是由魏入晋。郑默仕魏为秘书郎、司徒左长史,入晋后官至东郡太守、光禄勋。荀勖初仕魏为从事中郎,入晋后,历官中书监、秘书监、尚书令等。郑默《中经》撰在魏时,应是曹丕诏命所制,以“四部”类例也应是曹丕授意,因为“四部”之名最早便出自曹丕。

第五,“四部”之名出自曹丕,其意或为“四科”。余嘉锡云:

至荀勖晋《中经新簿》,始分四部,此学者所共知也。然汉、魏之间,实已先有四部之名。孔融文曰“证案大较,在五经四部书。”魏文帝《自叙》云“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以四部置之经史子集之外,则非荀勖之四部矣。所指为何等书,无可考证。以意度之,七略中六艺凡九种,而《刘向传》但言“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盖举《易》《书》《诗》《礼》《春秋》立博士者言之,则曰五经;并举乐言之,

则曰六艺;更兼《论语》《孝经》、小学言之,则为九种。汉末人以为于九种之中独举五经,嫌于不备,故括之曰五经四部。四部者,即指六艺略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也。此虽未有明证,而推测情事,或当如此。……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魏文帝《典论·自叙》称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谓四部者,似在五经诸子之外,亦不知其何所指。”^{[30]145}

钱大昕和余嘉锡都看到曹丕把五经、四部连称,故其“四部”不应是荀勖、李充之“四部”,余嘉锡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认为,所谓“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应是包括经(五经)、史(史汉)、子(诸子百家之言)、集(四部)的。这样说,是把“四部”理解为其文体“四科”,四科当然属于“集”部。原因是前文所述的文体“四科”是源于“五经”的,故而五经下来便说四部,二者联用是有深意的。我们本文在论“四科”,故对曹丕“四部”而言,权备一说。至于结论正确与否,也当如余氏所言“此虽未有明证,而推测情事,或当如此”。

目录书及总集之“四分法”中,“诗赋”一脉相承,曹丕“四科”之“诗赋”具有承前启后的链条作用。目录书所谓“四部”法,唐以后才明确称经、史、子、集,之前荀勖、李充等皆称甲、乙、丙、丁。具体称谓是: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经、史、子之名无异,集部则一直以“诗赋”来统称。所以说,从刘歆《七略》、班固《汉书》之“诗赋略”到曹丕“四科”之“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再到荀勖、李充等目录书“四部”之“五经、史记、诸子、诗赋”,再到真德秀“四目”之“辞命、议论、叙事、诗赋”,顺序是目录、文体、目录、文体之循环往复,曹丕“四科”和“诗赋”之位置和地位一目了然。

[参 考 文 献]

- [1] 郭绍虞,王文生.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 张少康,刘三富.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3] 敏泽.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 周勋初.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5] 朱恩彬. 中国文学理论史概要[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
- [6] 章新建. 曹丕[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 [7] 吴承学. 文体学源流[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1).
- [8] 张进. 李清照《论词》与曹丕《论文》[J]. 人文杂志,1995

- (4) .
- [9] 刘运好. 论曹丕之“本”与“本同”[J].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2) .
- [10] 効天庆. 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4) .
- [11] 朱全庆, 王兆才. 曹丕文学观的思想渊源及价值取向[J]. 东岳论丛, 2001(2) .
- [12]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3] 胡红梅. 曹丕文体学思想新解[J]. 长江学术, 2012(3) .
- [14] 扬雄. 法言[M]//诸子集成: 第7册. 李轨, 注.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 [15] 班固. 前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6]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17] 郁沅, 张明高.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18]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9] 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20]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1] 易健贤. 魏文帝集全译[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 [22] 曾巩. 元丰类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9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3] 孙明君. 曹丕《典论·论文》甄微[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 .
- [24] 任竞泽. 《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史地位[J]. 北方论丛, 2011(6) .
- [25] 文彦博. 潞公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00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6] 梁潜. 泊菴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3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7] 王澍.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684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8] 胡道静. 中国古代的类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9] 傅刚. 昭明文选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0]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1] 来新夏. 古典目录学浅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责任编辑 杜 敏]

Identify on Cao Pi's Stylistics Thought of "Talking About Classic and Talking About Literature"

REN Jing-z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Style of the source is the same, however, end is different. It is a controversial problem in Cao Pi's stylistics thought. Opinions vary about What is the "same sourc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ny people's point of view, I think all kinds of style comes from the five classics. This illustrates the Cao Pi with Confucianism. Cao Pi broke the Confucian thought, this idea is questionable. About the "four subjects and eight kinds of styl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eight kinds of style" is a literary styl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duc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four subjects" is the "four classification". Its impact on Zhen Dexiu. It is the source of Confucius of the four subject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books as well as the bibliography "four parts", etc.

Key words: Cao Pi; different end from the same source; the five best class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nfucianism; eight styles in the four disciplines; bibliography